

《台灣文藝》的客籍作家群與其原住民族書寫^{*}

黃雨婕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bigmobonbon@gmail.com

摘 要

一般研究者討論 1964 年創刊的《台灣文藝》，大多論及《台灣文藝》為當時的本省籍作家提供純文學的創作園地、銜接日治與戰後台籍作家等成果。有趣地，在《台灣文藝》的本省籍作家內，本文發現獲刊稿的作家為客籍者又幾乎過半。這個現象對於閩客人數始終有明顯落差的台灣來說，格外值得注意。此外，《台灣文藝》內以原住民族書寫為主要或間接題材的作品，又多為客籍作家創作。

職是之故，本文將自客籍族群與原住民族間親近的地緣關係出發，輔以作家個人經驗，藉以說明客籍作家原住民族書寫的背景因素。本文同時將分析客籍作家於《台灣文藝》所發表的原住民族相關小說或論述，藉以歸納戒嚴時期客籍作家關注的原住民族議題。本文希冀，透過對《台灣文藝》作家群、作品內容的族群面向進行分析，能夠為《台灣文藝》創建、定位與其文學圈作出更全面的評價。

關鍵字：台灣文藝、客家、原住民族、地緣、戒嚴時期

◎ 收稿日期：2018 年 10 月 15 日；審查通過日期：2019 年 6 月 21 日。

^{*} 本文初稿原題〈論《台灣文藝》客籍作家的原住民族書寫〉，宣讀於國立臺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主辦的「第 7 屆台政台文所研究生學術研討會」（2013 年 11 月 23 日），承蒙會議評論人馬翊航及在場諸位先進賜予寶貴意見。同時感謝此次《台灣學誌》匿名審查委員的悉心審閱，在此謹致謝忱。

一、前言

一般論者討論第一本「戰後本土化純文學」雜誌《台灣文藝》時，多研究《台灣文藝》銜接日治與戰後台籍作家的成果（陳芳明，2011：481）、提供本省籍作家發表創作的園地（張金墻，1999：140），以及對寫實主義美學的推崇與擴展（應鳳凰，2007：95-96）¹。

有趣地，本文細究《台灣文藝》後，發現客籍作家的比例頗高。此雜誌的創辦人吳濁流，以及接辦主編的鍾肇政，即是眾所皆知的客籍作家。更值得注意地，客籍作家創作的主題，除了一般風土民情與評論外，尚有部份作品以原住民族人物為主題，或者內容出現原住民族人物的身影。此類自《台灣文藝》開始書寫原住民族主題的客籍作家，日後亦分別為原住民族文學或書寫，創作和整理不少文學作品。

不難理解，在 1983 年「原住民開始介入台灣的書寫世界」（孫大川，2005：207）以前，文學的原住民書寫多是出現於非原住民族作家的作品中。然而，若以《台灣文藝》主要的閩、客作家來點閱，客籍作家書寫原住民的情形又相較閩南作家多。何以在族群議題風起雲湧的八〇年代之前，文學作品的原住民書寫呈現這樣的特徵呢？客家與原住民族群之間，是否具有一定程度的關聯，致使一部分客籍作家格外關注原住民族呢？

地理應是其一解釋。以空間鉅觀，原住民族和客家族群的淵源起之甚早。鑑於移民的原鄉生活型態、爭奪土地與生活資源等因素，使得客籍住民大部分居於丘陵、縱谷、近山等地，並與（高山）原住民間產生（較福佬族群更為）緊密的連結。客籍移民與原住民族群間的連結，不僅表現在地緣環境、生活習慣，更有研究者以客籍與原住民族毗鄰與互動為基礎論點，研究雙方神話的彼此影響（范姜烺欽，2011：201-220）。

當然，地緣關係仍然無法逐一闡釋客籍作家的議題趨向；此時，微觀的個人經驗或許可以為部分答案指點迷津。雖然在八〇年代以前，台灣閩、客、原住民的區分似乎被相對於「外省」的「本省」標籤淡化——意即「本省」與「外省」的省籍差異才是最明顯的社會矛盾，「本省」內部的區別與矛盾卻被省籍情結所掩蓋；²然而，在客籍作家的

¹ 應鳳凰於此篇論文中，將《台灣文藝》歸在純文學雜誌的寫實主義系譜。

² 按照王甫昌的說法，目前台灣主流的「四大族群」說法（亦即，原住民、客家人、福佬人及外省人），大概是 1993 年由民進黨立法委員葉菊蘭與林濁水提出（王甫昌，2002：86）。二次大戰後，台灣「本省人」與新移入「外省人」接觸的不愉快，以及不對等的社會地位，尤其導致「閩客區分」未若「本省與外省」的分類來得明顯。「福佬、客家之間的差異，在『省籍』差異的陰影下受到壓抑」（王甫昌，2002：168-169）。即便國民黨在地方行政首長的派任上，刻意維持閩客的平衡；但是，在中央政權與國家文化政策上，閩客受到

個人經驗上，身為「少數」的感受及其造成的影響卻未絲毫稍減。在客籍作家吳錦發自述的原客接觸經驗裡，作為少數（客籍族群）與更為少數者（原住民族群）接觸的起點，正是因為兩者的少數與邊緣。誠然，客籍與原住民族的邊緣位置絕不能等量齊觀；但是，作家的微觀經驗依舊指陳了兩個少數族群之所以切近的可能原因。除此之外，推動作家筆桿的原因也可能是生長經驗、政治與社會環境的變化等等，而這些因素都將是本文要加以分析與論述的一環。

承上，本文認為《台灣文藝》作家族群的分布，以及客籍作家群筆下的原住民族書寫，乃是值得注意與研究的課題。是故，本文將由《台灣文藝》的成立背景及編輯發展史出發，指出此雜誌在戒嚴時期，對提供本省籍作家創作園地、保留台灣本土寫實作品的重要性。除此之外，本文同時將分析《台灣文藝》作家族群，期望在「本省」——鬆散含括福佬、客家與原住民族的大範疇之下，進一步為《台灣文藝》書陳更細膩的屬性與意義。

首先，本文將目光鎖定族群分殊劇烈、原運勃發的八〇年代末以前的《台灣文藝》期數，從中分析閩客作家書寫原住民的比例與異同，進而指出客籍作家對於原住民議題確實相對注目的事實。接著，本文將利用客籍移民和原住民族相互親近的地緣關係，試圖解釋部分客籍作家於《台灣文藝》內的原住民書寫。扣除「地理」的主要闡釋之外，本文亦會從族群的社會位置、個人生長經驗等面向，對作家個人進行微觀的討論。

最後，本文抽取客籍作家在《台灣文藝》所發表的原住民相關小說或論述進行分析，³藉以探索客籍作家群對於原住民族議題的關注視角。最重要地，本文將透過這些文本，回顧族群議題被進一步論述之前的時代，檢視過去並且盼望指引未來。跨族裔的書寫從來都不是易事，或僭越或代言都是危如累卵。因此，我們必須知道：即便文本的分析與省思有其必要，但是客籍作家關注原住民族的熱切溢於紙本，研究者的後見之明絕然無法抹滅作家在特殊時空的重要意義。

二、本省作家的《台灣文藝》與其客籍作家群

1964年4月1日創刊於台北的《台灣文藝》，乃是吳濁流先生以兩萬元獨資所主辦。出版四期月刊後，吳濁流決定憑靠募款，以各方的捐款和部分作家的義務編輯（當時《台

的差別待遇未見二致。

³ 筆者必須在此說明：念及長篇的故事與敘事較能爬梳創作者對原住民族的看法。因此，本文僅採錄小說、散文或論述等文章，並不特別選錄與原住民族議題相關的新詩。

灣文藝》並無人事費的支出)(鍾肇政, 1984), 將雜誌的第五期改為季刊形式, 持續發行不輟。

草創前, 吳濁流曾舉辦兩場座談會: 一為「閒談文藝座談會」(1964 年 2 月 22 日), 另一場較為人提及的會議為「青年作家座談會」。「青年作家座談會」邀請日治時期作家、跨越語言的作家, 以及受中文教育的戰後第一代新銳作家出席(陳芳明, 2011: 480-485; 張金墻, 1999: 132)。除邀集各方討論台灣文學發展的前景外, 此次座談會的舉辦也可以看出吳濁流凝聚、聯絡各世代本省籍作家的努力。⁴

吳濁流創刊初期邀請龍瑛宗、吳瀛濤擔任主編; 而後, 改由同為本省籍的鍾肇政與趙天儀, 分別協助小說及新詩的編務。從上述編者的背景來看, 吳濁流在確立台灣文學獨特性時, 更努力提拔新一代本省籍作家。就事實來看亦是如此:《台灣文藝》在戒嚴時期, 不僅為日治作家與跨越語言的本省籍作家(如江肖梅、黃得時、張文環、王詩琅、巫永福; 鍾肇政、張彥勳、林亨泰、陳千武、廖清秀、葉石濤、林鍾隆等), 提供了發表的園地, 更刊出熟稔中文寫作的戰後本省籍作家作品(如黃春明、七等生、李喬、吳錦發、宋澤萊、鄭清文、施明正、東方白、鍾鐵民、黃娟等)。因此,《台灣文藝》從創刊後到解嚴前夕, 幾乎可說是本省籍作家發表作品的園地與孕育的搖籃。

《台灣文藝》對於拉拔本省籍作家的努力, 實深受時代背景所影響。自 1949 年遷台以後, 國民政府箝制人民的言論、出版等自由, 又推動「反共文學」、「軍中文藝」、「戰鬥文藝」等文藝政策。此種政治動員的文藝潮流, 使得未經歷大陸內戰經驗、不理解中華民族意識的本省籍作家, 無法取得文學發言的位置。何況, 經歷近五十個年頭的日本殖民統治, 大部分本省籍作家早已習慣日文書寫與思考。然而, 接收台灣的行政長官公署卻在 1946 年 10 月斷然地禁用日文, 罹患「歷史失憶症」與「失語症」(陳芳明, 2011: 219)。

準此, 在 1964 年《台灣文藝》成立前, 本省籍作家不論語言使用、文學創作、作品發表等都較外省籍作家困難。此現象還可自《台灣文藝》成立的年代加以印證: 應鳳凰〈戒嚴時期台灣文藝雜誌發展歷程及系譜〉一文提及,「從文藝雜誌發展史來看, 本土文學潮流於戰後文壇是起步最晚的。《現代文學》已經辦了四年,《文壇》已經辦了十二年, 第一份本土文學刊物: 吳濁流《台灣文藝》遲至 1964 年才呱呱誕生。」(應鳳凰, 2007: 94)。推究其因, 亦應與本省籍作家發言位置邊緣、語言跨越的困難有關。

⁴ 與會作家有: 鍾鐵民、鍾肇政、張彥勳、陳永善(陳映真)、趙天儀、白荻、薛柏谷、林衡道、林鍾隆、江文雙、陳千武、王憲陽、廖清秀、施翠峰、陳火泉、文心、吳濁流等 27 人。此次會議,《台灣文藝》並未刊登紀錄, 與會作家資料見陳芳明、張金墻的研究。

《台灣文藝》的創刊未受到廣泛的注意（陳芳明，2011：483）⁵，即便是創辦人吳濁流亦非當時文壇的主流作家。然而，本省籍作家根植於土地生活經驗而行之的「在地化」書寫，使《台灣文藝》有別於當時社會的反共文藝氛圍，或者學院派的現代主義試作。《台灣文藝》反而向寫實主義與反映鄉土風情地貌的目標聚焦。時至今日，部分仍然為人所熟知的鄉土作家，皆是在《台灣文藝》即嶄露頭角：如鍾肇政、李喬、鍾鐵民、鄭清文、黃春明⁶等。

歷來的研究亦多著眼《台灣文藝》的本土性格與承先啓後的使命。最早詳盡研究《台灣文藝》的專著應為張金墻《斷裂與再生：〈台灣文藝〉研究》。張除了為《台灣文藝》分期、統計各期作家名單，更論述了雜誌承繼日治文學傳統、集結本土作家、帶動現實主義、引領文學與文化運動等意義。

以之後者，依舊延循相似研究主軸：蔡翠華〈六〇年代《臺灣文藝》小說研究（1964-1969）：以認同敘事為中心的考察〉（2010）即指明《台灣文藝》的精神根源於日治時期新文學傳統；蔡亦認為《台灣文藝》沿用寫實的敘事手法，並以吳濁流為首，形塑了異於六〇年代文學主流的伏流。除此之外，國族認同的撕裂與重整、鄉土書寫的底蘊、女性議題等亦是此論文探討的主軸。吳梅君〈七〇年代鄉土文學中的〈台灣意識〉：以《台灣文藝》小說為例〉（2010）以雜誌於七〇年代刊出的小說為本，緯合與此同時的鄉土文學運動，進而翻尋潛伏的台灣意識與認同。

奠基於《台灣文藝》培育「本土籍作家」之重要性的前行研究，本文進一步比對雜誌內發表作家的籍貫，赫然發現客籍作家的數量極多。此現象尤以吳濁流與鍾肇政擔任主編時期特別明顯。⁷舉例而言，吳濁流時期（創刊號～第53期）內，出現34名小說作家（張金墻，1999：275），其中已知為客籍作家者即占16名，⁸如七等生、丘秀芷、吳濁流、林柏燕、李喬、廖清秀、鄭清文、鄭煥、鍾樺、馮輝岳、林鍾隆、鍾鐵民、鍾肇政、江上、黃娟、黃文相等。鍾肇政時期（第54期～第59期），出現23名小說作家，其中已知為客籍作家者亦占11名，如王幼華、廖清山、雪眸、宋澤萊、吳錦發、鍾延豪等（與吳濁流時代重複者，不再次羅列）。另外，鍾肇政時期改變編輯方針，逐漸為《台

⁵ 陳芳明認為，在現代主義主導的1960年代，「《台灣文藝》並未受到廣泛的注意，卻成為本土作家集結的大本營。」

⁶ 在此須說明，黃春明早期亦曾在《台灣文藝》發表現代主義色彩濃厚的小說〈男人與小刀〉。

⁷ 各研究多以主編或負責人的變化為《台灣文藝》分期。大致可以分為：吳濁流、鍾肇政、陳永興、李敏勇（一說台灣筆薈）、林文欽（前衛出版社）、李喬等時期。上述分期可以參考陳芳明（2011：485）與張金墻（1999：165）之研究。

⁸ 作家的客籍身分之確定頗為困難，尤其台灣本身即為族群混雜的社會。此處的客籍身分，多參考鍾肇政編《客家台灣文學選》（1994），尚下載參考客家委員會製作的「客家委員會客籍作家」資料集：<https://cloud.hakka.gov.tw/details?p=%20123892#>。

《台灣文藝》增加文學研究與評論的比例（鍾肇政，1997）⁹；統計 10 名評論者中，亦有 4 名為客籍，如日後知名的評論者彭瑞金等。鍾肇政時期之後的陳永興時期，其中客籍作家占小說作家一半以上；然而，此時期的客籍作家僅陌上塵為新面孔，其餘皆已在前兩個時期出現。

由上述資料可知，早期《台灣文藝》的作家群中，客籍作家幾占半數。本文無法明確肯定，客籍作家占據半數的原因與吳濁流、鍾肇政即分別是新竹新埔、桃園龍潭的客家住民，故特別提拔客籍人士是否有關。不過，我們可以自鍾肇政某次的自述窺見一二端倪。鍾肇政在《客家台灣文學選》序文中，提及一次被唐突詢問「為何台灣文學界的作家們，都是客家人？」鍾肇政略加思索後，也才發現當時文壇吳濁流、鍾理和、李喬等人，較為人所談及的作家，皆為客籍（鍾肇政，1994：2）。我們可以藉此斷定，《台灣文藝》客籍作家比例偏高的事實，或許並非是刻意提拔的結果。

八〇年代鄉土文學運動蓬勃之後，鄉土文學似乎以「福佬／河洛文學」為主導，客家文化與文學卻屈居本土化論述的邊緣。相較之下，六〇年代聚集本省籍作家的《台灣文藝》，其中客籍作家幾乎過半的事實倒別具意義。這些客籍作家對台灣文學更產生一定的影響力。鍾肇政在《客家台灣文學選》的序中甚至如此總結，

六〇年代，吳濁流毅然決然辦起了《台灣文藝》，形成戰後台灣文學第一個凝聚點，吸引了絕大多數的當時台灣作家參與旗下。其中，福佬與客家約略參半，說是客籍作家主導了這一段時間的台灣文學，大概不算太勉強。（鍾肇政，1994：4）

鍾肇政的說法十足印證了《台灣文藝》閩客作家數目相當的時代性事實，值得研究者注目再三。

因此，在本省作家寫作與發表都較外省作家困難的六〇年代，《台灣文藝》不單是「本省作家」的文學園地；一旦考慮到客家與福佬人口的落差，鍾肇政的一句「客籍作家主導了這一段時間的台灣文學」怎能等閒視之？¹⁰前行研究多以「本省作家」當作《台

⁹ 1997 年，《台灣文藝》新任主編鍾肇政在〈編輯室報告〉提出新目標之一：「創作與評論並重而尤重後者」。

¹⁰ 福佬與客家人口的統計至今是困難的挑戰。根據日治時期的統計，1926 年台灣漢人祖籍福建的比例為 83.1%，祖籍廣東的比例為 15.6%；而且祖籍廣東者也並非全部使用客語（施添福，1987：13-14）。然而，從清代移墾台灣以來，客家人的「福佬化」（或者福佬人的客家化）也可能產生個人原鄉、語言與認同之間難以追源、定義的可能（洪麗完，1990：168）。不過，依據官方所能檢索到的最新「105 年度全國客家人口暨語言基礎資料調查研究」（2017）指出，台灣第一大族群仍是福佬，占 69.0%。第二大族群為「客家人」，占 16.2%——當然，這份資料是按照「單一自我認定」作為基礎來統計的，仍舊包藏著祖籍原鄉與個人認同之間難解的統計闕漏。不過，我們依舊可以知道，至少日治以後，福佬與客家人口始終存在明顯落差。

灣文藝》的研究基準；然而，作家祖籍的分析卻進一步還原了族群性，在在為《台灣文藝》與客籍作家的研究突出了重大意義。

三、原客關係與書寫

既然《台灣文藝》集結當時大多數本省籍，尤其占半數是客籍作家的作品；於是，研究《台灣文藝》的作品取向，或許可以揭開客籍作家關懷的主題面紗。翻閱八〇年代以前多期《台灣文藝》，本文發現書寫原住民族的小說或論述者多為客籍作家。在本文翻閱的期數內¹¹，原住民現身的小說約 18 篇¹²，當中包括原住民作家陳英雄的 2 篇〈雛鳥淚〉與〈地底村〉。

在 18 篇內，簡略提及原住民人物的小說計有 10 篇，當中客籍作家占 6 篇。所謂「簡略」是指，小說僅將原住民作為小說的枝微背景，一晃而過。例如，外省作家兩峰〈不開的杜鵑〉（1968：4-9）描寫一位男子與舊情人的種種回憶與再相逢；相逢路途上，男子車過梨山，看見「已經有臉上刺花的山地老婦在賣過早摘取的果實」。洪文慶〈妾家何處〉（1967：43-50）敘述一名女子被養父母轉賣至妓女戶的故事；鴇母對抵死不從的女子提及從牡丹來的一位山地姑娘，如何接受事實而下海的例子。東方白〈浪淘沙：浪〉寫到百年前客家人來到大溪與三峽之間的丘陵地砍樟，「山上的生蕃」砍過不少腦丁的頭，所以這些客家人只得用竹籬圍出城堡，名曰「烏鴉錦」（東方白，1981：92）。施明正〈煉之序〉之中，生活失意又有感戰後政治混亂的羅鰻猛啊回首一生，感嘆「我既無法像番仔那樣只靠劣酒在酒精掩蓋的迷宮裡，也無法像他們那樣忘本，忘我地為日本狗仔到南洋出草人命……」只得隱居山林，且靠酒精度日（施明正，1982：90）。

即便是客籍作家，亦有僅僅背景式草寫原住民身影的作品。例如，鄭煥〈她不會再回來了〉（1968：53-56）描寫一個苦悶山間國校男老師的失敗戀情。小說開頭寫到比這間國校更深山的國校「就讀的都是山地兒童」。另外，宋澤萊〈花城悲戀〉（1980：51-67）由 K 君對敘事者說一段富家女被拋棄而自殺的故事。敘事者似乎頗為不屑富家女的作為，認為富裕之人只把婚姻當作工具，其煩惱微不足道；文末，敘事者轉而對 K 君說一個「山地女人和老兵結合」的「成功」婚姻故事，彷彿暗示著後兩者的結合才是具體真

¹¹ 本文翻閱八〇年代以前《台灣文藝》的期數分別為 15、16、17、19、20、25、26、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1、42、43、44、45、54、55、56、58、60、63、65、66、67、68、69、70、71、72、73、74、75、76、77、78-79（合刊）、80、81、82、83、86、88 期，共 51 期。

¹² 當中包含客籍作家李喬〈寒夜〉連載的其中 5 期、吳濁流〈台灣連翹〉連載的其中 2 期；不過，本文將連載小說不論刊載期數，皆計為一篇。

實、腳踏實地的選擇，而非無病呻吟的風花雪月。尚有 3 篇都是吳濁流的作品，〈路迢迢〉以一段的小篇幅寫到日本軍官褒揚高砂義勇隊的英勇事蹟；〈無花果〉則提及敘事者（應為吳濁流自傳）從小未曾看過原住民，直至從新竹鄉間去到台北念書，才在勸業共進會上頭初次接觸原住民（吳濁流，1967：53-68，1968：64-75）；〈台灣連翹〉其二的兩期連載各自提到了日本「民山歸公」政策對於近山番仔的大討伐，以及小說敘事者提及霧社事件的震撼，擊碎了他在山中安逸教書的夢而激發了民族感情（吳濁流，1973：74，1974：66）。最後一篇為龍瑛宗戰前日文小說〈獺〉的中文重譯版，其提及了重要閩客分布，故內容將置於下節討論。

最後，真正以原住民人物、原住民族議題為小說主軸者僅 6 篇，此中客籍作家占 5 篇，唯一非客籍作家的作品為胡台麗的〈吳鳳之死〉（1980：73-87）。單就以上《台灣文藝》的基礎而言，不論其內容具體或簡略敘事與否，客籍作家書寫原住民族的比例都較為高。後文將再詳盡分析此 5 篇小說。

至此，我們不妨先行瞭解漢人的原住民書寫。二戰以後，漢人的原住民書寫並非罕見，近年來「漢人的原住民書寫」的研究亦方興未艾。劉智濬〈認同·書寫·他者：1980 年代以來漢人原住民書寫〉（2011）即以深刻的自我省思出發，挖掘漢人的原住民書寫存在著如何的認同焦慮與贖罪意識；劉認為，漢人的原住民書寫乃是透過書寫「他者」來尋求自我認同、確認自己是誰的過程，進而鬆動了身份認同的邊界，甚至渴望原漢融合後所建構的新身份——即便書寫者當下並未意識到這般深層伏動的動力。蔡政惠〈戰後臺灣作家文學中的「原住民族書寫」：自 1945 到 1987〉（2015）分析漢人對原住民族的書寫，除了藉以補足對早期原住民處境的認識，亦仔細梳理原住民族書寫的時空背景與發展脈絡。在分析過後，蔡觀察發現原住民族的族群定位，有著隨時代變遷而更迭的特色——從早期被殖民的悲情形象，直至中後期飽受歧視與經濟弱勢的負面、卻又是祭典當中自然、熱情、勇敢的正面形象並陳的樣貌。

往更細微的分類前進，客籍作家的原住民書寫同樣有其論著。郭慧華〈鍾肇政小說中的原住民圖像書寫〉的首要貢獻便是細膩整呈原住民「被書寫」的歷史。在戰後部分，郭說起漢人作家的原住民書寫逐漸增加，「如鍾理和（1915～1960 年）、鍾肇政（1925 年出生）、葉石濤（1925 年出生）、李喬（1934 年出生）等人都有相關作品開始產生。」（郭慧華，2004：15）。值得注意地，光是郭點名的 4 位作家，即有 3 位為客家籍。隨著台灣國際政治情勢劣化，七〇年代各大專院校勃生對島內的熱情，因而春筍般現出「山地服務」運動；部分作家對於原住民題材的關心即出於此，如吳錦發等（郭慧華，2004：17）。

不可忽視地，郭對於鍾肇政原住民書寫，歸因於客籍移民與原住民的密切互動；而兩者的互動又根植於地理的接近。在台灣大多數的地區，居住在近山區域的客家族群，通常與原住民族有相當親近的地緣關係。早年積極推動原住民族文學的客籍作家吳錦發，當初編選《悲情的山林》的 11 篇作品之時就發現，9 位涵蓋戰後老中青三代作家，其中 5 為客籍、1 為閩籍、1 為外省籍、2 為原住民籍。吳錦發在編選序言中猜測道，

客家籍作家對山地為背景的小說表現比較多，大概和客家人在歷史淵源上和原住民接觸比較頻繁有關係吧；台灣在開墾之初，漳、泉一代的閩籍移民來得比較早，佔據了大部分平原地區，粵籍的移民隨後才到，只能選擇較近山腳的偏僻地區落腳，因此在生存競爭和原住民的關係比較密切，所以客籍作家多有描寫山地背景的著作。（吳錦發，1987：序）

事實上，關於客籍移民居住近山一帶的原因，已經有不少研究者專文討論。討論的結果眾說紛紜，無一定論。洪麗完〈施添福著《清代在台漢人的祖籍分布和原鄉生活方式》〉整理學界多提的三種說法（洪麗完，1990：161-169），各是先來後到的順序、械鬥遷徙導致落敗的粵籍移民只能往山區搬遷、選擇近似渡台前原鄉的環境等。

即便客籍移民居住近山的原因莫衷一是，客家族群與（高山）原住民族有著相當接近的地緣關係，卻是不爭的事實。相近的居住地，使得客家族群和原住民族間交往頻繁。例如，童經生在《台灣文藝》發表〈客家人與原住民〉一文中指出，客家人不論在中國或者台灣，與原住民的關係皆非常密切：「客家人居處山陵地帶，與住山地的原住民更有接觸，與原住民通婚一定不少。李喬寒夜三部曲、張良澤四十五自述及戴國輝文章中，都有原住民母系血統融合到台灣人的例子」（童經生，1987：130）。

不只研究者認為客籍移民與原住民族交融，部分在《台灣文藝》裡發表原住民族相關書寫作品的客籍作家，亦曾自述與原住民族緊密接觸的經驗。例如，居住在大湖山區蕃子林的李喬，自小與泰雅族為鄰，且受該族老酋長影響頗深（林瑞明，1993：9）。吳錦發雖是高雄美濃的客家人，但是此地接近布農族人聚居的六龜地區，吳的曾外祖母正是六龜的布農族人，吳擁有八分之一原住民血統；¹³吳錦發幼年常常看見布農族人帶著山產，自美濃到旗山交易（郭慧華，2004：44）。承上，客籍作家的原住民族書寫，有其歷史與地緣的因素，恐非「偶然」一詞可以點撥。

¹³ 此說法出處為郭慧華對吳錦發的訪談。

當然，並非所有的客籍人士都世居近山，其親近原住民的經驗不一而足；即便居住地靠近原住民地區，亦難確保毗鄰相望。例如，吳濁流〈無花果〉的客籍敘事者祖居新竹鳳山溪沿岸（近今日關西、新埔、竹北），敘事者至前往台北讀書前，都沒見過原住民——即便關西山區散居少數泰雅族原住民。

誠然，本文無法一一證成書寫原住民的客籍作家何以書寫或未書寫原住民；畢竟，客籍作家人數浩博，地毯式的證明工作終究難竟全功。相對地，與其拉開浩浩蕩蕩的隊伍來驗證地理說法的普遍性，本文更想析論的是：在《台灣文藝》裡，書寫原住民的那些早期客籍作家當中，多少人、多少比例是因為地緣接觸而促生對原住民族題材的關注？若是真能發現一定的空間趨向，仍不失為《台灣文藝》、客家文學、甚或原住民族文學未來可能的研究取向。

既然居住地得以一窺客籍作家原住民書寫的管貌，卻可能無法縱其全觀；那麼，還有哪些因素促發客籍作家書寫原住民呢？以下，本文將針對上述《台灣文藝》的選材小說當中，「真正以原住民人物、原住民族議題為小說主軸者」的客籍作家與作品，進行鉅觀與微觀面向的梳理。

四、《台灣文藝》客籍作家的原住民族書寫

首先，本文必須強調：客籍作家的原住民族書寫，並非始自於《台灣文藝》。郭慧華〈鍾肇政小說中的原住民圖像書寫〉即詳析了客籍作家「龍瑛宗」戰前書寫的原住民族文本。

龍瑛宗世居新竹縣北埔鄉，此處正是泰雅族與少數賽夏族的分布地區。¹⁴龍瑛宗家族在北埔從事樟腦生意的世祖，即有三位遭泰雅族誅首；因此，龍瑛宗創作的〈夜流〉、〈斷雲〉等小說內可見相關情節。另外，龍瑛宗尚有描繪與原住民族接觸，進而相親相容的文本。郭慧華以為龍瑛宗的原住民族書寫實屬難得，「在那個年代當中，漢民族對邊緣弱勢族群的忽略、誤解或心存恐懼其實是極為普遍的現象，作家會在作品中提到原住民的，真是鳳毛麟角。」（郭慧華，2004：25-28）

¹⁴ 參見原住民族委員會網站〈原住民族分布區域〉：<http://www.apc.gov.tw/portal/docList.html?CID=6726E5B80C8822F9>，瀏覽日期：2016.08.10。

鍾肇政主編《台灣文藝》期間，台灣文藝出版社曾經發行《台灣文藝小說選》，當中輯錄了龍瑛宗〈獏〉的中文版。¹⁵小說藉由主要敘事者「我」的旁觀，推動敘事描述富家好友「徐青松」的浪蕩一生、家族衰落，以及徐青松最終成為勞動者的落敗。不僅如此，〈獏〉刻畫了許多在地鄉情、風土舊慣，譬如喜慶八音班、村裡的盲樂師、纏足祖母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小說開頭花了一些篇幅介紹徐家的興起，其中刻繪了些許原住民與客籍人士的互動，

大約一百年前，這裡住著高砂族的人們。當時，徐青松的曾祖父抱著夢與野心，成了一名墾首，募了一批墾房，來到這裡從事開墾。無可避免地，發生了種種糾葛，流了血。雙方都出了犧牲。高砂族的人們搬到更深的山地去了。（龍瑛宗著、鍾肇政譯，1981：36）

根據王惠珍的研究指出，〈獏〉的场景是新竹北埔客家莊（王惠珍，2011：60）；加以，小說曾描述徐青松醉酒以後，「一支一支地唱起我們地方的民謠『山歌』來」，間接凸顯當地應為客家庄。因此，小說的情節與龍瑛宗的家族經驗有著相似性，可以想見作家世居的經驗或多或少轉化為敘事鋪陳的細節。尤其，這篇小說寫於龍瑛宗調派花蓮、更為親近東部原住民之前；是故，地緣關係的居住經驗許是此段最為可能的詮釋因素。¹⁶

同時，《台灣文藝》亦曾是早期為原住民作家提供發表機會的園地。在吳濁流主編之時，《台灣文藝》便在 20 期、28 期刊登排灣族作家——陳英雄的短篇小說〈雛鳥淚〉、〈地底村〉。據張金墻所言，這應是戰後最早刊登原住民文學的刊物（張金墻，1999：184）。鍾肇政於 1965 年主編《本省籍作家作品選集》時，亦收錄陳英雄的作品；鍾肇政同時於〈編輯的話〉指陳，陳英雄似乎是高山作家中的第一人，並期許陳英雄持續寫作（鍾肇政，1965：3）。由此可見，吳濁流和鍾肇政都特別關注原住民族議題，並且鼓勵原住民族作家的寫作。

在刊登原住民族作品後，《台灣文藝》開始出現客籍作家書寫「原住民族」的作品，當中尤以鍾肇政擔任主編時期為多。以下將就《台灣文藝》客籍作家書寫原住民族的作

¹⁵ 此選本裡頭的中文版〈獏〉，應該是鍾肇政為龍瑛宗翻譯的版本，即同於《台灣文藝》第 63 期的刊行內容。〈獏〉原是發表於戰前的《日本の風俗》雜誌，關於「戰前原刊版」與「戰來再譯版」的異同問題，王惠珍曾進行了細膩的比較研究：原刊版因為「客籍作家龍瑛宗為符合雜誌編輯之需」，因此以新竹北埔客家莊為題材。原刊本與後來再譯的「校樣版」的差別在於「情節上進行了大篇幅的補充說明」（王惠珍，2011：60）。

¹⁶ 根據王惠珍的梳理，〈獏〉最早刊於 1941 年 1 月，龍瑛宗則是 1941 年 4 月至 1942 年 1 月之間調派台灣銀行花蓮分行（王惠珍，2007：276）。龍瑛宗調派花蓮前後描寫的原住民族群亦可以發現些微的不同。故鄉北埔為泰雅族居住區域，調任地花蓮則多阿美族（王惠珍，2007：302）。

品進行分析，藉此探究客籍作家對於原住民族的描寫面向、族群境遇的對照，以及客籍作家所關注的原住民族議題。

（一） 鍾肇政

鍾肇政在擔任《台灣文藝》主編時，已知於雜誌上發表〈回山裡真好〉、〈馬拉松 冠軍 一等賞〉兩篇書寫原住民族的作品（鍾肇政，1980：27-46，1992[1980]：191-210）。事實上，鍾肇政相當關心原住民族議題。就郭慧華統計，1976 年鍾肇政接手《台灣文藝》，兩年後又擔任《民眾日報》的副刊主編，提攜後進卻減緩了自己作品的生產；不過，自 1978 年起約莫八年的時間，鍾肇政相關原住民族的作品進入創作顛峰期，「幾乎每年都有原住民相關作品的發表或寫作進行著。」（郭慧華，2004：34）¹⁷

與上述鍾理和、龍瑛宗不同，鍾肇政原住民書寫與祖居的地緣恐無太密切的關係；不過，其與原住民接觸的經驗，仍然與「空間」牽連。郭慧華的專著論文著重討論鍾肇政小說的原住民圖像，並且試圖用歷史與地理背景——亦即客家人多世居山區，「易與原住民發生接觸」、「隱然賦予了客籍作家就近接觸、關切的優勢」——來解釋鍾肇政身為客籍，卻書寫原住民的其一動機。¹⁸從前後論述觀之，郭慧華所謂「地理背景」，乃是集中於客籍移民在台多居山間的事實。然而，鍾肇政自述第一次接觸到原住民的經驗，卻是少年時期，隨鍾父因為工作分派而舉家去到八結（大溪到復興鄉角板山中間，靠近泰雅族域地）才發生（鍾肇政，2008：197）。從自述看來，鍾肇政親近原住民族的經驗與個人空間遷移有關，卻不適用整體客籍移民居於山間的解釋。

更值得關注地，鍾肇政之所以書寫〈馬拉松 冠軍 一等賞〉、〈回山裡真好〉兩篇小說，其動機乃是出於鍾肇政的女兒參加大學「山地服務隊」，帶回的部落見聞與現況（郭慧華，2004：34）。根據下村作次郎的說法，七〇年代台灣的國際政治位置孤立，激發了知識分子對於社會參與的關心，因此大專院校的學生開始梯次、梯次間前往原住民區域（下村作次郎著、邱振瑞譯，1997：248）。從作家的機緣來看，國際因素帶動的社會氛圍轉變，亦促發了鍾肇政的原住民書寫——而此情況大概是「世居地」說法絕難想像的方式。

¹⁷ 除《台灣文藝》外，鍾肇政尚於其他報章連載多本長篇小說，如書寫霧社事件的《馬黑坡風雲》（1973）等，關懷的議題相當廣泛。

¹⁸ 郭慧華析論地緣接觸為可能因素之後，仍有稍及鍾肇政「人道主義式的文學悲憫與良心」，或許也是其能夠長久關心原住民議題的原因；同時，她亦於後文節錄鍾肇政的說法，載明鍾肇政親近原住民乃是隨父親移居至工作地以後才開始之事。不過，綜合郭論文對於客籍作家書寫原住民的首要原因，卻明顯集中於客籍移民的空間分布。當然，此說法顯然無法解釋鍾肇政移居以後才初次接觸原住民的經驗。

〈回山裡真好〉描寫泰耶魯（泰雅族）青年武達歐遠離山上，至六十公里外的學校寄宿就讀。然而，武達歐無法融入迥異於深山的學校生活，加以學校老師動輒嘲笑，因此武達歐已有兩次擅自離宿、自己步行回家的紀錄。在一次酒後鬧事的意外後，武達歐由父親暫時領回，靜候學校處分。等待入山班車的武達歐，想著回家後得以與父親共同打獵，不禁偷偷地自言自語：「回山裡真好。」

首先，鍾肇政在此篇小說中，使用不少漢字拼音泰雅族語，如武達歐稱母親為「亞亞」、父親為「亞爸」、打獵為「嘎拉賀」、出草為「馬嘎嘎」等。作家欲提升敘事生動度與原住民人物立體感的動機不難想見；只是，部分用字的正確性有待商榷。¹⁹

論及語言，鍾肇政也似乎有意識論及日本殖民、國民政府遷台對原住民族言說、溝通所造成的影響。例如，武達歐的雙親在討論由誰帶領逃學的兒子回校時，彼此都十分恐懼與校方溝通：

「妳自己不會送他去。」亞爸說。

「我怎麼可以？我不會講國語。」

「我也不行。」

「你可以跟他們講福佬話。日本話也行。」（鍾肇政，1980：33）

短短四句的對話，小說卻提及了國語（中文）、福佬話、日本語等三種語言，卻無一是武達歐亞亞、亞爸的母語。此場景明白凸顯出台灣遭受日本政府殖民及國民政府治理後，語言混雜且適應不及的窘境；更難堪地，原住民族向來是被迫學習和使用它族語言者。而或許是同樣身為少數族群，客籍作家鍾肇政甚至描寫原住民族將通曉「福佬話」作為溝通工具，似是暗示著少數族群弱勢再弱勢的邊緣位置。另外，本篇小說裡寫到父母稱呼主角為武達歐。然而「武達歐」在學校卻使用中文名「陳約翰」；此「雙重身分」亦顯示外來政權的語言與統治政策為原住民族的主體帶來混亂。

小說同時諷刺著日本政府更替帶來的「文明」，只是為了滿足政權利益的虛偽，何以會比傳統文明更高尚？亞爸與武達歐在閒談裡聊到：日本政府殖民後，泰耶魯已無馬嘎嘎（出草）的傳統。然而，武達歐確實記得亞爸曾自述有「馬嘎嘎」的經驗，故以此

¹⁹ 本文透過原住民族委員會的「原住民族語言線上詞典」，查閱泰雅族語的父親、母親、打獵與出草（出草沒有對應的泰雅族語，故而本文是使用「馘首」作檢索）等字。其他三字的發音大致符合，唯「打獵」的發音與「嘎拉賀」有些微出入。不過，網站至少羅列 12 個相關打獵的發音，我們難以確知何者的發音與意義最為正確；而以漢語諧音拼出泰雅族語，作者可能難以避免翻「音」的歧誤。所以，本文認為這部分的語言正確性或許僅是「有待商榷」而非明顯錯誤。

詢問。亞爸回答：他曾經馬嘎嘎乃是因為「打仗」，更提及村莊內有 21 名壯士前往南洋，僅亞爸在內的 3 人平安歸台。作者間接點出，日本殖民政府於太平洋戰爭期間，徵召原住民擔任「高砂義勇隊」的史實。鍾肇政設計此橋段，刻意將早已遭受禁止的馬嘎嘎傳統，與日本發動的戰爭行為並置；這個文明與傳統的並置，實是對於日本政府以文明為由禁止馬嘎嘎，卻發動大規模戰爭、徵召原住民赴死的最大嘲弄。

在結尾處，鍾肇政藉由幾位老師的對話，刻畫當時非原住民者，對原住民的刻板印象及不友善言論：

「(指武達歐自學校徒步回家)六十幾公里呢。真不得了。」

「天生的馬拉松人才吧。」

「野蠻人，天生的野蠻人！」

誰？誰是野蠻人呢？武達歐急步離開那裡。他的心在篤篤急跳，腦子漲得幾乎要炸裂似的。他說的會是誰呢？一定不是我。當然不是，我怎麼會是個野蠻人！（鍾肇政，1980：45）

鍾肇政藉由短短的一篇小說，深刻地思考台灣族群之間的優勢與弱勢，仔細觀察了原住民族弱勢地位、社會處境，更點出文明的矛盾與偽善。

另一篇小說〈馬拉松 冠軍 一等賞〉由村莊裡一年一度的馬拉松拉開序幕。往年參加比賽僅獲得第二名的主角山普洛，誓言在堂叔老瓦丹的教導下，奪得今年度的冠軍。老瓦丹雖然曾經是善戰的高砂義勇隊一員，也曾在日治時期多次拿下學校的馬拉松一等賞；但是，敘事中與山普洛對話的老瓦丹，卻成了鎮日醉醺醺酒鬼，往日榮彩已然黯淡。故事便藉由山普洛回憶與老瓦丹的對話，帶出作者關注的原住民族議題。最後，在老瓦丹一塊兒跑向終點的陪伴下，山普洛幾乎要奪得冠軍！此時，老瓦丹卻突然倒在道旁，而山普洛毅然丟下賽事奔向老瓦丹……。

首先，題目所示的「馬拉松」比賽，即是明顯受到日本殖民統治影響而有之的活動。其中，鍾肇政在〈回山裡真好〉已處理過的語言問題，又於此篇小說出現。例如，戰前世代的老瓦丹與戰後出生的山普洛，分別稱呼「第一名」為日語「一等賞」和中文「冠軍」，故時常對彼此的用詞感到困惑。又漢族友人常以中文姓名「李德田」稱呼山普洛，亦每每使山普洛感到不自在。

馬嘎嘎與戰爭的並置也同樣出現在本篇小說。在日本殖民時代，老瓦丹是前往南洋協助戰士的義勇兵。同於〈回山裡真好〉，小說亦利用新世代的山普洛將南洋戰事混淆為

馬嘎嘎，諷刺日本殖民政府的殘酷和矛盾。更甚者，本篇描寫老瓦洛曾經前往南洋，努力為日本政府而戰；但是，老瓦丹的亞爸（父親）、山普洛的尤達斯（祖父）輩卻殺了許多日本人。上兩代對日本政權的相反態度，讓山普洛相當困惑，百思不得其解之下詢問老瓦丹，

「可是奇怪，瓦丹、尤達斯他們，還有你的亞爸，不是殺了好多日本人嗎？」「是啊。」「那你怎麼又跟日本人一塊去馬嘎嘎呢？」「不是馬嘎嘎，笨人。」「不是嗎？」「當然不是，那叫戰爭。」……「可是瓦丹，你還沒回答我。為什麼跟日本人……」「噢，你不會懂的。」……（鍾肇政，1992[1980]：197）

外來政權的殖民，不僅迫使原住民族無故犧牲，更混亂了族群世代間的認同。三代之間不過幾十年的時間，抵抗政權或擁護政權的經驗就矛盾至此，無怪乎未曾被打獵難倒的老瓦丹，面對姪輩山普洛的疑問只能呻吟苦思不語。

鍾肇政曾自述他給過自己一個命題：要「揭發」日本組織高砂義勇隊的祕密。早年鍾肇政研究霧社與川中島時，發現父兄被日軍屠殺、被迫移居川中島的原住民青年，卻在十年光景以後，踴躍應徵成為高砂義勇隊的勇士（鍾肇政，2008：200-201）。何種祕密得以讓日軍操弄義勇軍的效力？鍾肇政認為答案很簡單，正是日本教育灌輸的皇民思想。從〈馬拉松 冠軍 一等賞〉，我們不難窺見鍾肇政字裡行間確立的命題意識——即便答案在此篇小說之中還是隱而未見，留待後來鍾肇政的其它長篇小說來揭露。

〈回山裡真好〉與〈馬拉松 冠軍 一等賞〉具有某種程度的相似性。不只是因為兩篇小說的主要角色都是面臨語言問題的原住民少年、敘事背景都與國民學校有關；頗令人在意地，兩篇小說都提到了「酒」。

在〈回山裡真好〉裡頭，學校生活苦悶、備受老師冷落的伍達歐鬱卒飲酒而鬧事。無獨有偶，〈馬拉松 冠軍 一等賞〉的其一情節，亦寫到地方重要人物的兒子「李阿財」向山普洛承諾：若是山普洛奪冠，就請山普洛喝酒，「愛喝多少就有多少」。乍看之下，這個承諾只是純粹的鼓舞之話；然而，敘事又接著讓山普洛回想到某次不堪的經驗：山普洛喝了酒，糊裡糊塗闖進阿財嫂的房間，驚嚇了阿財嫂。原本生氣的阿財哥威嚇要抓山普洛進派出所，最後卻只是惡狠狠警告山普洛「喝了酒，千萬別來我家，一步也不許踏進！」於是，此時的山普洛一邊比賽，一邊思考著：究竟討厭山普洛喝酒的阿財哥會不會實行承諾？統觀兩篇小說的原住民少年形象，似乎都是天真苦悶，卻又好飲杯中物而易鬧事的面向。姑且不論人物刻劃得成功與否，兩篇小說似乎無意間僵化了原住民青年的形象，實為可惜。

（二） 鍾延豪

1970 年代末，鍾延豪初躍文壇便成為頗受矚目的文壇新秀，創作時有獲獎。1980 年開始，積極協助時任《台灣文藝》主編的父親鍾肇政處理編務。編輯期間寫作趨緩（鍾肇政編訂，1992：291）。然而，《台灣文藝》尚可尋得鍾延豪一篇採訪稿〈霧社今昔〉（鍾延豪，1980：217-245）。²⁰

鍾延豪自述〈霧社今昔〉的寫作動機，出於對「在文明進襲下，原住民自給自足的傳統生活面臨巨大改變」的觀察。因此，本文除簡要說明霧社事件（包括二次霧社事件）的始末，作者更詳實記錄了當時的霧社現況。值得注意的是，早逝的鍾延豪並未留下太多作品與自述，難以確知其書寫原住民的緣起。不過，此篇〈霧社今昔〉部分呈現出與鍾肇政相似的關懷，值得研究者再考。

首先，作者描繪出對霧社的第一印象。鍾延豪極為驚訝採訪當時霧社觸目可見各式商店、光亮的櫥窗，令人彷彿置身都市。針對此現況，作者即便不全然認同，卻沒有一味的批評：

古舊社會在前往進步的當兒，必定要脫離某些根深蒂固的傳統文化，這是不容置疑的，但若因著文化上的理由，只為了保持傳統，便要反對進步，也未必是可取的事情。（鍾延豪，1980：221）

不可否認地，鍾延豪上述評論的邏輯不脫「傳統」與「進步」的二元窠臼；然而，鍾延豪也確實於此展現其對於原住民族經濟發展、文化保存，應該如何並進發展的關懷。

即便作者體認原住民族利用觀光改善經濟景況的迫切性，卻仍然進一步思考「觀光」對於傳統部落的衝擊及破壞。

最重要的是居著在這裡的山民，他們已習於這種暴發戶式的生活了，再沒有人願意樸實的在農事上討一碗飯吃。……也許有一天，這裡又會進一步建設「文化村」，像花蓮阿美族，像石門水庫仙島樂園的山地村一樣，靠著大雜燴的歌舞，以開闢觀光財源了。（鍾延豪，1980：223）

²⁰ 鍾延豪早逝，未留下太多作品。除此篇採訪稿，鍾延豪全集內尚收錄一篇〈陳君的日記〉，書寫都市原住民女性淪落為妓的故事。然而此篇小說並非發表於《台灣文藝》，故未於本文討論。

鍾延豪此段評論所言甚重。觀光姿態與樸實農事都是原住民族於現代社會之下謀生的可能工具。該如何取舍勢必有其族群經濟與景況的考量，當然無法以「習於暴發戶式的生活」一語憑斷。不過，鍾延豪卻也點出一個現實：山區觀光也許終究變成文化符號的消費，最後可能將傷害原住民族的傳統文化。

採訪稿尚關懷原住民族的教育問題。當鍾延豪採訪霧社時發現：相較於受新式教育的原住民青年，那些無法跨越語言、連帶無力適應工商業社會的前世代原住民，他們的生活逐漸遭受重大打擊：

對約莫在三十五至四十歲的山地同胞來說，……，由於不及接受日式的教育，即又摒棄在光復後的校門之外，他們同時擁有著半生不熟的日語及國語，迷失在現實生活之中。（鍾延豪，1980：219）

鍾延豪的這段記錄，恰好為我們提供八〇年代初，卡在政權交替、社會弱勢地位的原住民族所面臨的求職與經濟困境。

據此，鍾延豪針對教育方針作出建議，「必得與平地的目標要有所區別才行。……，不是盡講些『台北市……黑龍江……茶……糖……海中生物……』」（鍾延豪，1980：244）。鍾延豪希冀透過教育，原住民族得以學習本土、本地的熟悉事物，並藉以建立對自身民族的自信心（鍾延豪，1980：219）。

〈霧社今昔〉亦提及在外來政權治理下，原住民國族認同出現混亂的情形。在此，鍾延豪關注的命題，以及解讀的路徑都與鍾肇政有著相似的看法：鍾延豪採訪了高砂義勇隊的生還者「阿烏依」。阿烏依的父親是霧社事件裡頭，抗暴成仁的一員。阿烏依卻在日本政府的教育下，將「為天皇效命」的意識內化，興奮慷慨地前往南洋作戰。此段專訪突顯日本殖民政府「皇民教育」的灌輸，如何在短短一世代間，將抗日烈士的後代轉化為勇猛英烈的義勇軍。

鍾延豪在本篇文章中，記錄另外一名義勇軍「高聰義」的採訪。高聰義自小失去雙親而被日人收養。高聰義而後不僅擔任義勇軍，更在太平洋戰爭期間，以流利的日語鼓勵「台灣青年的覺悟」，進而為殖民國犧牲奉獻。針對高聰義鼓動台灣青年為天皇而戰的事實，鍾延豪展現對時代的理解與寬容，評論富同理心，「以當時的情況而言，高聰義是被日本人所利用了，然而高聰義先生的作為，今天我們當然不能有絲毫的批評，所謂『可憐的殖民地』指的便是這樣的心情」（鍾延豪，1980：239-240）。

（三） 李喬

如前文所述，李喬家族世居大湖山區蕃仔林，與原住民泰雅族為鄰；族群間關係緊密，「原住民出草時，往往會事先通知我們」（轉引自蔡政惠，2015：284）。李喬在《台灣文藝》最為人熟知的，便是自第 57 期開始連載的《寒夜》。《寒夜》旨在描寫一客家家族，於附近「蕃仔林」開墾山林的過程。

鑑於故事主軸皆環繞近蕃界墾殖的經過，故本篇小說有些許篇幅描繪原住民族的習俗（如鹹首），以及泰雅族人將過世先人埋葬於床底等傳統。因為開墾的關係，蕃仔林經常承受著原住民為保衛家園而出草的威脅。然而，小說最終卻描寫日本侵台之時，原本擔任隘勇（守護蕃界以防堵原住民越界出草者）的人，最終與泰雅族頭目聯合抗日。本來緊繃的族群關係，在面對外來侵略者的逼迫下，展現聯合抗暴的民族情誼。

除長篇小說《寒夜》外，李喬尚有一篇短篇小說〈泰姆山記〉發表於《台灣文藝》（李喬，1993[1984]：233-286）。本篇小說旨在描寫二二八事件爆發後，台灣知識分子「余石基」無辜遭受通緝而逃亡山林的故事。余石基最初質疑原住民好友瓦勇對山林的信仰，以及原住民的山林傳說；敘事輔線刻畫知識分子的心靈：原先，余石基自憐自艾，不斷自問「何以政治逃兵還會淪落至此」？余石基卻又以良心鞭笞自我，自慚不配接近台灣的心臟山林。最終，余石基還是相信了傳說的真實，並且一心朝最純粹的島嶼之心前進。

〈泰姆山記〉開頭即刻畫了余石基與原住民「同年」（為原住民語「同心朋友」的意思）窩興及瓦勇的情誼與義氣，並且透過三人之間的對話，凸顯曹族（鄒族）愛好山林、與世無爭、相信自然傳說的民族特性。更重要地，小說將「窩興」設定為領導嘉義機場反抗事件的湯守仁；湯守仁不僅是當時的原住民族知識分子，更是勇於抗暴、為政治犧牲的青年。相較之下，主角余石基內心充滿對社會的不滿，卻總是勒令自己要為了妻小吞忍，反而活得相當不得志。

〈泰姆山記〉最重要的場景就是鄒族傳說之中，不隨意讓外人看見與攀爬的泰姆山。鄒族獵人「瓦勇」說，阿里山附近一帶原住民皆深信不疑的「泰姆山」傳說：此山乃是台員（台灣）的中心。唯有對其尊敬的人，才能安然躲避山林守護神「醋因」（毒蛇）的侵擾，直達山頂。乍聽這個傳說，余石基不免嗤之以鼻；待到逃亡之時，一聽及瓦勇要為余石基指引前往泰姆山的路，余石基更是十分不耐煩。末了，走投無路的余石基還是聽從命令，而且最後相信了泰姆山的傳說，在泰姆山上尋得最終的心靈平靜。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李喬耗費許多心神描繪泰姆山的傳說，並且複合多重族群傳說與

歷史人物，²¹小說卻仍然顯得平板。在小說中，泰姆山附近部落的人都說，泰姆山不歡迎「不愛山的，不是有大事，單想去玩的」人（李喬，1993[1984]：263）。此後，小說的後半段都集中在余石基自己內心的辯論：我是政治的逃兵，配得上泰姆山嗎？

「泰姆山」就這樣簡易地容納我嗎？

……我不關心自己來自何處，我也未替我的同胞盡力。我懦弱，我並未去做該做的，我只是為了保全這個污穢鄙陋的軀體，是苟且貪生而來這裏……

……他覺得自己不能「無恥」地再繼續上山，沒有資格獲得山的垂憐……（李喬，1993[1984]：270）

在此，泰姆山與鄒族的文化似乎都化為一個原始神祕、既守護土地山林又能抵抗政權入侵的象徵。劉智濬認為正是透過〈泰姆山記〉，原住民不再是有著出草傳統的生命威脅者，而是引領他族人到安息之所的前行者；台灣人對生命與土地的想望，回歸到原住民傳說中的大地之母，台灣的心臟（劉智濬，2011：131-133）。誠然，〈泰姆山記〉藉由敘事，台灣社會、政治與歷史的歸屬都交付、回溯至原始山林與原住民族；此般溯源與回歸，某種程度暗示了贖罪與返還。然而，小說後半段過度強調余石基不間斷的自相慚愧與自我質疑；一來一往之間，鄒族傳說的平和與原住民抗暴者的驍勇，似乎又只是烘托主角內心辯證的背景而已。

（四） 吳錦發

本文論及的客籍作家裡，吳錦發應該是最為積極關懷原住民族議題者。吳錦發自述「第一次接觸台灣山地社會」是在大學時期，前往宜蘭南澳鄉山地進行社會調查。有趣地，當時吳錦發其他閩南籍的同學都分發至平地鄉調查；唯有吳錦發一人是客家籍，「而且閩南語還不在靈光」，所以只有他一人上山（吳錦發，1987：序）。顯然，吳錦發是因為「客家籍」同為少數族群的經驗，而開啓第一次與原住民族社會接近的機會。²²

吳錦發的原客接觸經驗，隱然指出一個重要面向：若為闡釋客籍作家生產較多原住民書寫，除了居住空間的關係之外，同為邊緣族群的關聯亦不可輕忽。即便沒有相近的空間居住經驗，同樣的邊緣位置也可能使兩者走在一起。

²¹ 劉智濬指〈泰姆山記〉建構的原住民空間是多重元素複合的。余石基之所以逃往嘉義，是敘事為了讓嘉義機場事件的鄒族湯守仁出現；太陽、百步蛇、泰姆山（大武山）等情節，來自排灣族與魯凱族的神話（劉智濬，2011：133）。

²² 吳錦發甚至還說，原客之間較為深入的研究，「譬如：『原住民和客家人在台灣居民結構上都屬少數民族，是否因此也有相濡以沫的情感存在？』則有待各類社會科學專家來參與了。」凸顯客籍吳錦發自身對於兩個少數族群之間關聯性的觀察（吳錦發，1987：序）。

不過，值得強調地，即便第一次的深入研究起因於山地服務，這次經驗卻不是吳錦發最早接觸原住民族的經驗。吳錦發的自述曾經提到祖居地的地緣關係，間接讓他對原住民族印象深刻。吳錦發為高雄美濃人，其從小居住的客家庄靠近布農族聚居的六龜。根據郭慧華訪談吳錦發的紀錄，童年時期的吳錦發時常看見布農族人（郭慧華，2004：44）。不過，吳錦發依舊坦承過，在山地服務之前，他對於原住民的觀念是「吳鳳式」的，認為原住民族人野蠻未開化。直到大學時期的實際相處，吳錦發初次離開漢民族的視野，體驗到另一種民族的思考與看法。自此，吳錦發除書寫原住民相關作品，更發願對台灣原住民進行回報和贖罪（吳錦發，1987：序）。為真切落實理念，吳錦發在 1987 及 1989 年分別編纂台灣原住民文學系列《悲情的山林——台灣山地小說選》、《願嫁山地郎——台灣山地散文選》等書。

吳錦發曾於《台灣文藝》發表〈燕鳴的街道〉短篇小說（吳錦發，1987[1983]：271-292）。故事描寫電影公司員工吳仔，偶然結識一名在餐廳裡擔任琴師的賽夏族女子「卜幼瑪」。在都市生活的卜幼瑪時常被欺侮，敘事尤以平地男人對於卜幼瑪的各種不尊重言行，刻畫原住民族人遭受的歧視與污名化，甚至凸顯出原住民「女性」更加惡劣的現代生活困境。

隨著台灣教育的普及、產業結構的轉變、現代文明的衝擊，原住民族青年開始遠離家鄉，進入都市尋求工作機會，部落生活文化也急遽改變。例如，卜幼瑪與高采烈參加祭典後，便急著離開家鄉。吳仔問起原因，卜幼瑪回答，

「幼瑪，不是我說妳，妳——好像不喜歡妳的家？」
 「家？什麼家？媽的，只會向我要錢的家——」
 「我是說整個家鄉！」
 「怎麼會？不喜歡，這回我就不會帶你上山來玩了！」
 「但是我看妳祭典一完就顯得寂寞了！」我突然抓住她的手。

……

「寂寞……，是啊，整個賽夏都是寂寞的！」（吳錦發，1987[1983]：281-282）

部落面臨資本經濟的衝擊，逐漸脫離傳統生活；而卜幼瑪體認到為了提供家用，不得不迫切地前往都市謀生的無奈，內心也充滿憤慨。吳錦發更以「整個賽夏的寂寞」，暗示原住民族傳統生活在現代社會之下，快速凋敝的落寞。

〈燕鳴的街道〉同時描繪了當時社會對原住民族存在極惡劣的偏見，而原住民族——特別是女性——幾乎無時無刻都會遭遇蠻橫的對待。正當卜幼瑪遲遲無法進入電影

拍攝狀況而拖累進度時，攝影師便脫口而出：「笨死了，笨山地仔！」等低俗的話語。又如卜幼瑪與某貿易公司經理的婚外情被揭穿，經理太太亦以「山地母狗」咒罵卜幼瑪。卜幼瑪每次都要武裝自己，剽悍地反擊無理的族群偏見與性別標記。

通篇最怵目驚心的橋段莫過於，卜幼瑪反擊前男友酒後的騷擾後，男子便說：「我操你媽，我操你媽……臭番仔，死番仔，老子今天不弄死你才怪！」小說的敘事凸顯出，原住民族被刻意以「山地」、「番仔」加以歧視，並且不時被迫與「笨」、「性開放」等負面字詞連結。

即便吳錦發描繪都市原住民景況、為原住民族發聲的意圖明確且立意良善；小說敘事線卻出現將原住民族性別化的疑慮。當卜幼瑪自述正是因為賽夏都是寂寞的，所以「下到平地我們得不斷找男人啊！」、「但……，媽的，你們這些平地男人，卻常常弄得我更加寂寞！」的時候，吳仔除了強調自己不是那些平地男人，還接著自述「我、也、是、半、個、山、地、人」。依據小說前後文來看，吳仔應該不具原住民族身分。²³他之所以如此說，或許是敘事欲凸顯吳仔富有同理心，並且尊重、認同原住民族。小說當中的吳仔亦的確是格外欣賞原住民族文化（例如：敘事透過吳仔的旁觀，細描賽夏族祭典的過程），並且多次為卜幼瑪打抱不平。

不過，在「半個山地人」的發言之後，吳仔除了自言瞭解卜幼瑪的痛苦之外，更厲聲批判卜幼瑪因為寂寞而屢尋男人懷抱的作為。

「我說我了解，了解妳寂寞，妳命苦，妳恨妳的家，妳恨……」我氣得語無倫次起來「妳需要男人，妳可以亂來，妳可以……，什麼都可以！就因為妳寂寞！」
（吳錦發，1987[1983]：282-283）

在這段敘述裡，有著原住民族身分的卜幼瑪是一個為了填補寂寞而隨意找男人——而且是平地男人——的女性，卻始終被平地男人辜負。而認同原住民族的平地人，卻成了關懷卜幼瑪混亂感情、批判卜幼瑪寂寞投射的仗義執言者——即便吳仔本人凝望跳著祭舞的卜幼瑪，亦曾在心裡想：「那真是一把野性的火焰，猛烈舔弄著我的心」（吳錦發，1987[1983]：273）。

²³ 當然，「我也是半個山地人」的說法，可能暗示著吳仔有著原住民血統（或許正如吳錦發本人一般）；下村作次郎解讀這篇小說時，亦將其視為「以客族血統中具有原住民血液成分的人為描寫對象的作品」（下村作次郎著、邱振瑞譯，1997：264）。然而，細讀文本，不論在吳仔這番告白之前，或者之後，卜幼瑪始終都以「平地男人」稱呼吳仔。因此，本文不擬驟下血統說的結論。

小說最後，吳仔攻擊了準備侵害卜幼瑪的人，卻反而被對方糾纏。卜幼瑪為替吳仔解套，哭著脫下自己的衣服：「你們都來好了！看你們有多少個人，我一個一個……」。卜幼瑪身為原住民，身為女性的弱勢在此化為最令人痛心的情節，一筆道破雙重弱勢者的無力與悲痛。

然而，當崩潰的卜幼瑪嚇走了惡人，她卻滿面淚痕地問吳仔：「你……你還會要我嗎？」於此，敘事似乎讓受害的卜幼瑪將自我認同、自我接納的可能，再次轉送到一位平地男人手中。不久，卜幼瑪又用著接近哀求的語氣在吳仔耳邊輕問：「你……你真的要我嗎？」這次，吳仔悄悄伸出手，緊擁著卜幼瑪的肩頭，「像緊緊地擁著整個她的……，不，整個賽夏的孤獨一般。」末了，整個賽夏與卜幼瑪作為一位女子的身分重合，等待著一位平地男子的接納；而卜幼瑪與她的賽夏，終究還是被性別化的寂寞族群而已。

吳錦發作為早期原住民文學重要的推動者，其在當代台灣原住民文學的確立上「功勞厥偉」（孫大川，2005：209）。正如孫大川所言，吳錦發挖掘並且鼓勵原住民作家；吳錦發主編的《悲情的山林：台灣山地小說選》，亦是原住民文學與書寫的最早集結。不過，站在原住民研究與原住民文學結實碩然的今日，回望與省思原住民書寫的呈現勢有其必要。藉由不同的解讀與思維，我們或許可以為原住民書寫帶來更多元的未來。

五、結語

本篇論文分析《台灣文藝》本省籍作家的籍貫背景，發現雜誌內客籍作家幾占半數。八〇年代鄉土文學運動蓬勃以後，鄉土文學似以「福佬」語言或文學為主導，而客家與原住民文學則屈居本土化論述的邊緣地位。兩相對照之下，《台灣文藝》的成立除為「本省」作家提供原地之外，其聚集許多客籍作家的事實，更該是研究《台灣文藝》與戒嚴時期台灣本省籍作家文學時，不應被忽略的重要基礎。

再者，在《台灣文藝》裡以原住民族書寫為主要或間接題材的作品，多為客籍作家所創作。究其原因，多半與早期客家人居住於近山地帶，因而客家族群與原住民族間擁有親近的地緣互動有關。除此之外，本文亦關注地緣解釋力之外的因素。爬梳本文關注的客籍作家背景之後，本文發現客籍作家的原住民書寫又與國際政治動盪，牽動島內關心社會事務而發起的「山地服務隊」有關；另外，客家與原住民族的族群邊緣位置，也可能促發兩族的互動較其他族群多。

最後，本文針對客籍作家在《台灣文藝》發表的原住民族相關小說或論述，進行文本分析，歸納戒嚴時期客籍作家群的原住民族書寫大致反映幾個面向：其一，原住民族因為語言的問題而無法融入新興的工商業社會，進而加深社會弱勢。更重要地，政權的更替也直接造成原住民族世代間的認同矛盾。其二，反思原住民族傳統文化與現代進步思維之間的平衡，以及都市原住民族的生活景況。尤其，小說敘事凸顯都市原住民女性面對的景況是性別與族裔的雙重壓迫，格外引人省思。

然而，即便客籍作家書寫原住民族的立意明確，我們依舊必須謹慎檢視作家筆下的原住民族樣貌。本文研究認為，不論敘事是將原住民議題當作神話背景、單純而美好的民族性代表、土地精神的化身，甚至是性別化的弱勢群體，都可能反過來掩蓋了原住民族的主體，從而再次深化了刻板偏見。準此，我們必須時時謹記、刻刻警惕：在多元文化的理想底下，族群書寫始終不能停下回望與省視的腳步，方能步步將溝通與同理的基礎，站穩踏實。

引用書目

- 「客家委員會客籍作家資料集」，客家委員會，<https://cloud.hakka.gov.tw/details?p=%20123892#>，瀏覽日期：2020.09.10。[Archive of Hakkanese Writers. Hakka Affairs Council. Retrieved September 10, 2020, from <https://cloud.hakka.gov.tw/details?p=%20123892#>.]
- 〈105 年度全國客家人口暨語言基礎資料調查研究〉，2017，客家委員會，<https://www.hakka.gov.tw/Content/Content?NodeID=626&PageID=37585>，瀏覽日期：2019.08.10。[2016 Hakka Population and Language Survey Report. (2017). Hakka Affairs Council. Retrieved August 10, 2019, from <https://www.hakka.gov.tw/Content/Content?NodeID=626&PageID=37585>.]
- 〈原住民族分布區域〉，原住民族委員會，<http://www.apc.gov.tw/portal/docList.html?CID=6726E5B80C8822F9>，瀏覽日期：2016.08.10。[Distribution of Indigenous Peoples. Council of Indigenous Peoples. Retrieved August 10, 2016, from <http://www.apc.gov.tw/portal/docList.html?CID=6726E5B80C8822F9>.]
- 下村作次郎著、邱振瑞譯，1997，〈台灣原住民文學序論〉，收錄於下村作次郎，《從文學讀台灣》，台北：前衛，頁 244-278。[Shimomura, Sakujiro. (1997). Preface of Taiwanese Indigenous Peoples' Literature (Chen-jui Chiu, Trans.). In Sakujiro Shimomura, *Learning Taiwan from Literature* (pp. 244-278). Taipei: Avanguard.]
- 王甫昌，2002《當代台灣社會的族群想像》，台北：時報文化。[Wang, Fu-chang. (2002). *Ethnic Imagination in Contemporary Taiwan*. Taipei: China Times Publishing.]
- 王惠珍，2007，〈地誌書寫港市想像：龍瑛宗的花蓮文學〉，《東華漢學》，第 6 期，頁 275-314。[Wang, Hui-chen. (2007). The Geography Writes the Port City Imagination: Hualian Literature by Long Yingzong. *Dong Hw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6, 275-314.]
- 王惠珍，2011，〈殖民地文學的傷痕：論龍瑛宗《蓮霧的庭院》的禁刊問題〉，《臺灣文學研究集刊》，第 9 期，頁 53-89。[Wang, Hui-chen. (2011). The Trauma of Colonial Literature: Prohibition on the Publication of Long, Ying-zong's Novel Collection *Waxapple Tree Garden*. *NTU Studies in Taiwan Literature*, 9, 53-89.]
- 吳梅君，2010，〈七〇年代鄉土文學中的〈台灣意識〉：以《台灣文藝》小說為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在職進修碩士論文。[Wu, Mei-chun. (2010). *The Taiwan Consciousness of Taiwanese Nativist Literature in the 1970s: Take the Short Stories in Taiwanese Literature for Example*. In-service Master's thesis,

Department of Taiwan Culture,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吳濁流，1967，〈路迢迢〉，《台灣文藝》，第 16 期，頁 53-68。[Wu, Cho-liu. (1967). The Road with Long Distance. *Taiwan Literature*, 16, 53-68.]

吳濁流，1968，〈無花果〉，《台灣文藝》，第 19 期，頁 64-75。[Wu, Cho-liu. (1968). The Fig Tree. *Taiwan Literature*, 19, 64-75.]

吳濁流，1973、1974，〈台灣連翹〉，《台灣文藝》，第 41、43 期，頁 69-74、65-68。[Wu, Zhuo-liu. (1973, 1974). Formosan Weeping Forsythia. *Taiwan Literature*, 41 & 43, 69-74 & 65-68.]

吳錦發，1987，〈悲情的山林——序「臺灣山地小說選」〉，收錄於吳錦發編，《悲情的山林：台灣山地小說選》，台中：晨星，頁序。[Wu, Chin-fa. (1987). Preface of *Sad Wild: A Novel Anthology of Taiwan Indigenous Peoples*. In Chin-fa Wu (Ed.), *Sad Wild: A Novel Anthology of Taiwan Indigenous Peoples* (preface). Taichung: Morning Star Publishing.]

吳錦發，1987[1983]，〈燕鳴的街道〉，收錄於吳錦發編，《悲情的山林：台灣山地小說選》，台中：晨星，頁 271-292。(原收錄於《台灣文藝》第 82 期)[Wu, Chin-fa. (1987[1983]). Swallow is Crying on the Street. In Chin-fa Wu (Ed.), *Sad Wild: A Novel Anthology of Taiwan Indigenous Peoples* (pp. 271-292). Taichung: Morning Star Publishing.]

宋澤萊，1980，〈花城悲戀〉，《台灣文藝》，第 67 期，頁 51-67。[Sung, Tse-lai. (1980). Sad Love Story in the City of Flower. *Taiwan Literature*, 67, 51-67.]

李喬，1993[1984]，〈泰姆山記〉，收錄於李喬著、林瑞明、陳萬益主編，《李喬集》，台北：前衛，頁 233-286。(原收錄於《台灣文藝》第 86 期)[Li, Chiao. (1993[1984]). Mountain Tai Mu. In Chiao Li, *The Anthology of Li Chiao* (Ray-ming Lin & Wan-yi Chen, Eds.) (pp. 233-286). Taipei: Avanguard.]

兩峰，1968，〈不開的杜鵑〉，《台灣文藝》，第 19 期，頁 4-9。[Liang Feng. (1968). The Rhododendron Which Doesn't Bloom. *Taiwan Literature*, 19, 4-9.]

東方白，1981，〈浪淘沙：浪〉，《台灣文藝》，第 77 期，頁 86-92。[Tung-Fang, Bai. (1981). The Desert Island. *Taiwan Literature*, 77, 86-90.]

林瑞明，1993，〈愛恨分明的大地之子——李喬集序〉，收錄於李喬著、林瑞明、陳萬益主編，《李喬集》，台北：前衛，頁 9-13。[Lin, Ray-ming. (1993). Son of Earth Who Draws a Clear Distinction between Whom or What to Hate or Love: A Preface of *The Anthology of Li Chiao*. In Chiao Li, *The Anthology of Li Chiao* (Ray-ming Lin & Wan-yi Chen, Eds.) (pp. 9-13). Taipei: Avanguard.]

施明正，1982，〈煉之序〉，《台灣文藝》，第 75 期，頁 89-91。[Shih, Ming-cheng. (1982). Preface to Smelt. *Taiwan Literature*, 75, 89-91.]

- 施添福，1987，《清代在臺漢人的祖籍分布和原鄉生活方式》，台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Shih, Tien-fu. (1987). *Han People's Ancestral Home and Hometown Lifestyle in Taiwan under Qing Dynasty*. Taipei: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at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 洪文慶，1967，〈妾家何處〉，《台灣文藝》，第 15 期，頁 43-50。[Hung, Wen-ching. (1967). Where is My Home. *Taiwan Literature*, 15, 43-50.]
- 洪麗完，1990，〈施添福著《清代在台漢人的祖籍分布和原鄉生活方式》〉，《新史學》，第 1 卷第 3 期，頁 161-169。[Hung, Li-wan. (1990). Comment on Shih Tien-fu's *Han People's Ancestral Home and Hometown Lifestyle in Taiwan under Qing Dynasty*. *New History*, 1(3), 161-169.]
- 胡台麗，1980，〈吳鳳之死〉，《台灣文藝》，第 69 期，頁 73-87。[Hu, Tai-li. (1980). The Death of Wu Feng. *Taiwan Literature*, 69, 73-87.]
- 范姜烺欽，2011，〈台灣客家與原住民「人變動物」故事比較研究〉，《東華中國文學研究》，第 9 期，頁 201-220。[Fan Chiang, Hung-chin. (2011). A Comparative Study on Stories of "Human Beings Transforming to Animals" among Hakkanese and Indigenous Peoples. *Dong Hw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9, 201-220.]
- 孫大川，2005，〈用筆來唱歌：台灣當代原住民文學的生成背景、現況與展望〉，《台灣文學研究學報》，第 1 期，頁 195-227。[Pa'labang. (2005). Singing with a Pen: Background, Present Condition and Prospect on Contemporary Taiwanese Indigenous Peoples' Literature. *Journal of Taiwan Literary Studies*, 1, 195-227.]
- 張金墻，1999，《斷裂與再生——《台灣文藝》研究》，台南：台南市立文化中心。[Chang, Chin-chiang. (1999). *Division and Rebirth: The Study of Taiwan Literature*. Tainan: Tainan Municipal Cultural Center.]
- 郭慧華，2004，〈鍾肇政小說中的原住民圖像書寫〉，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在職進修碩士論文。[Kuo, Hui-hua. (2004). *The Depiction of Indigenous Peoples in Chung Chao-cheng's Novels*. In-service Master's thesis,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 陳芳明，2001，〈台灣新文學史：第九章 戰後初期文學的重建與頓挫〉，《聯合文學》，第 17 卷第 5 期，頁 150-163。[Chen, Fang-ming. (2001). A History of Modern Taiwanese Literature: Chapter 9. The Reconstruction and Sudden Stoppage of Literature in the Early Post War Period. *Unitas*, 17(5), 150-163.]
- 陳芳明，2011，《台灣新文學史（下冊）》，台北：聯經。[Chen, Fang-ming. (2011). *A History of Modern Taiwanese Literature (II)*. Taipei: Linking Publishing.]
- 童經生，1987，〈客家人與原住民〉，《台灣文藝》，第 118 期，頁 128-130。[Tung, Ching-sheng. (1987). Hakkanese and Indigenous Peoples. *Taiwan Literature*, 118, 128-130.]

- 劉智濬，2011，〈認同·書寫·他者：1980年代以來漢人原住民書寫〉，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博士論文。[Liu, Chih-chun. (2011). *Identity, Writing, and the Other: Han People's Writing on Aborigines Since 1980s*. Doctoral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Tainan, Taiwan.]
- 蔡政惠，2015，〈戰後臺灣作家文學中的「原住民族書寫」：自1945到1987〉，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Tsai, Cheng-hui. (2015). *The Postwar Literature of Taiwanese Writer "Indigenous Writing": From 1945 to 1987*. Doctoral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Kaohsiung, Taiwan.]
- 蔡翠華，2010，〈六〇年代《臺灣文藝》小說研究（1964-1969）：以認同敘事為中心的考察〉，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Tsai, Tsui-hua. (2010). *Studied of Fiction in "Taiwan Literature" during the 1960s: Narrative and Identity*. Master's thesis, Department of Taiwan Culture,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 鄭煥，1968，〈她不會再回來了〉，《台灣文藝》，第19期，頁53-56。[Cheng, Huan. (1968). *She Won't Come Back*. *Taiwan Literature*, 19, 53-56.]
- 龍瑛宗著、鍾肇政譯，1981，〈獺〉，收錄於鍾肇政編，《台灣文藝小說選》，台北：台灣文藝出版社，頁35-49。[Long, Ying-zong. (1981). A Tapir (Chao-cheng Chung, Trans.). In Chao-cheng Chung (Ed.), *A Novel Anthology of Taiwan Literature* (pp. 35-49). Taipei: Taiwan Literature Publisher.]
- 應鳳凰，2007，〈戒嚴時期台灣文藝雜誌發展歷程及系譜〉，《新地文學》，第1卷第1期，頁73-97。[Ying, Feng-huang. (2007).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Literary Magazine in Taiwan under the Period of Martial Law. *New Land Literature*, 1(1), 73-97.]
- 鍾延豪，1980，〈霧社今昔〉，《台灣文藝》，第66期，頁217-245。[Chung, Yen-hao. (1980). The Past and Present of Wu She. *Taiwan Literature*, 66, 217-245.]
- 鍾肇政，1965，〈編輯的話〉，收錄於鍾肇政編，《本省籍作家作品選集（第一輯）》，台北：文壇社，頁3-4。[Chung, Chao-cheng. (1965). Editor's Notes. In Chao-cheng Chung (Ed.), *The Selected Works of Native Taiwanese Writers (I)* (pp. 3-4). Taipei: Wen-Tan Publisher.]
- 鍾肇政，1973，《馬黑坡風雲》，台北：商務書局。[Chung, Chao-cheng. (1973). *The Story about Ma Hei Po*. 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Publisher.]
- 鍾肇政，1980，〈回山裡真好〉，《台灣文藝》，第66期，頁27-46。[Chung, Chao-cheng. (1980). Good to Go Back to the Mountain. *Taiwan Literature*, 66, 27-46.]

- 鍾肇政，1984，〈熬過二十年霜雪的《台灣文藝》滄桑史〉，《台灣文藝》（重刊本），第 1 卷，頁 5-20。[Chung, Chao-cheng. (1984). The Vicissitudes of *Taiwan Literature* through these Twenty Years. *Taiwan Literature* (Republished Version), 1, 5-20.]
- 鍾肇政，1992[1980]，〈馬拉松 冠軍 一等賞〉，收錄於鍾肇政著、彭瑞金主編，《鍾肇政集》，台北：前衛，頁 191-210。（原收錄於《台灣文藝》第 70 期）[Chung, Chao-cheng. (1992[1980]). Marathon, Champion and the First Prize. In Chao-cheng Chung, *The Anthology of Chung Chao-cheng* (Jui-chin Peng, Ed.) (pp. 191-210). Taipei: Avanguard.]
- 鍾肇政，1994，〈客家文學的界說〉，收錄於鍾肇政編，《客家台灣文學選 1》，台北：新地出版社，頁 1-2。[Chung, Chao-cheng. (1994). Clarification of Hakkinese Literature. In Chao-cheng Chung (Ed.), *An Anthology of Hakkinese Literature (I)* (pp. 1-2). Taipei: New Land Publisher.]
- 鍾肇政，1997，〈編輯室報告〉，《台灣文藝》，第 54 期，頁 2。[Chung, Chao-cheng. (1997). The Report from Editor. *Taiwan Literature*, 54, 2.]
- 鍾肇政，2008，〈我小說中的原住民經驗〉，《台灣原住民族研究季刊》，第 1 卷第 4 期，頁 197-201。[Chung, Chao-cheng. (2008). My Own Experience of Contacting Indigenous Peoples. *Taiwan Journal of Indigenous Studies*, 1(4), 197-201.]
- 鍾肇政編，1994，《客家台灣文學選 1》、《客家台灣文學選 2》，台北：新地出版社。[Chung, Chao-cheng. (Ed.). (1994). *An Anthology of Hakkinese Literature (I) & (II)*. Taipei: New Land Publisher.]
- 鍾肇政編訂，1992，〈鍾延豪生平寫作年表〉，收錄於鍾延豪著、施淑、高天生主編，《鍾延豪集》，台北：前衛出版社，頁 291-293。[Chung, Chao-cheng. (Ed.). (1992). The Chronological Table of Chung Yen-hao's Writing. In Yen-hao Chung, *An Anthology of Chung Yen-hao* (Shu Shi & Tien-sheng Kao, Eds.) (pp. 291-293). Taipei: Avanguard.]

The Hakka Writers and Their Writings on Taiwanese Indigenous Peoples in *Taiwan Literature*

Huang, Yu-chieh

**Ph.D. Candidate,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In 1964, Taiwanese writer Wu Zhuo-liu established a literature magazine named *Taiwan Literature*. While there were few place for Taiwanese writers to publish their works during the White Terror period in Taiwan, *Taiwan Literature* is said to serve as a meaningful platform that gathered the works of Taiwanese writers of generations before and after the War.

Interestingly, although Holo is the biggest ethnic group in Taiwan, and Hakka occupies only one-third of its population, the magazine published works of almost an equal number of Holo and Hakka writers. What's even more interesting is that, Hakka writers, in fact, wrote many works about Taiwanese indigenous peoples, and it was not commonly seen in other literary works at that time.

Therefore, in terms of their close relations in residential area and also the writers' personal experiences of ethnic interactions, this article aims at exploring the reasons why Hakka writers depicted the lives of Taiwanese indigenous peoples. Moreover, issues regarding indigenous peoples presented in these works will also be analyzed. It is hoped that after doing so, we could get a clearer understanding of *Taiwan Literature* and its status in literary field.

Keywords: *Taiwan Literature*, Hakka, Taiwanese indigenous peoples, geography, period of martial law

